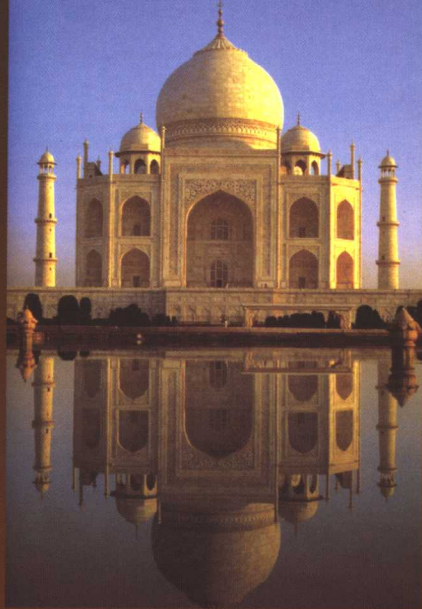




印度与中国

——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

〔印〕谭 中 著
〔中〕耿引曾



商务印书馆

印度与中国

——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

[印]谭中 [中]耿引曾 著

商务印书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
谭中、耿引曾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ISBN 7-100-04843-5

I. 印… II. ①谭…②耿 III. 文明—研究—印度和中国
IV. K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269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得到北京大学教育基金资助

印 度 与 中 国
——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
〔印〕谭中 〔中〕耿引曾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843-5/K·903

2006年3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frac{1}{4}$

定价: 28.00 元

序

季 羨 林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世界人口最多，又有历史上最辉煌的人类文明传统的大国，自古以来一直是睦邻。两国在精神与物质文明的许多领域中进行过至少两千多年的交往，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并且形成促进社会进化的动力。

中印两国有很多共同的文化特点。我认为最明显、最重要、最基本的是我们实际上有着同样的思维模式。以中印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思维模式是综合型的，西方的思维模式却是分析型的。这两种思维模式所呈现出来的差异在在皆是。比方说，哲学上的不同十分明显。中国从宋朝以来已经有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宋代的哲学家张载在《西铭》中说：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我们发现印度也有类似的表达：“Brahmatmaikyam”(Brahma 和 atma 的统一)。其中“Brahman”指的是宇宙的原理，汉译为“梵”，“atma”指的是自我的本质、自我的实体。简言之，印度与中国都把宇宙(自然)当做自己的亲密朋友。人类和大自然互相热爱、互相友好，和睦共处。在这一大前提下，我们从宇宙自然界摄取人类生活必需的物质。

与此相反，在西方，人们受到他们的思维模式驱使，把宇宙当作他们的敌人。他们竭尽全力征服自然，其结果可以从当前的宇

宙现象中清楚地看出。许多弊病越来越明显,比方说,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臭氧层被损伤,清水越来越少,生物种类濒临绝种,新的病毒不断出现,还有人口爆炸等等。这一切都是由于西方对大自然的敌对态度而引起的,每一现象都会影响人类将来的生存。十多年前,我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Eastern culture alone can save the mankind)的简短讲话。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人类未来的进步将会证实这一真理,这也是本人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东方学人,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学者,应该把东方哲学思想发扬光大,为全世界造福。中印两国学者应当合作,尽一切努力把东方整体观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在人类活动中付诸实施。

现在耿引曾和谭中教授共同写出这本书。他们号召中印学者参与到这一中印文明对话的事业中来,做出贡献。这真是史无前例的文化事业。我深信,它将受到我们两个伟大国家广大人民的欢迎。我想用一种生动的比喻形容:这本书将会是中印传统友谊与文化交往的几千年古树上开出的新鲜花朵。它必将增进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不仅是学术界,而且是普通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

真理万岁!

季 美 林

(原文用英文写成,由黄绮淑译成中文)

祝 词

师尊泰戈尔曾经先知先觉地写道：“古希腊之灯在它本土熄灭，古罗马的强力已死，被埋在大帝国的废墟之下。但是以社会与人类精神理想为本的文明却仍然活在中国和印度。虽然它在当前工业机械威力的眼光下显得弱小，却像那细小的种子，有着生命力，将会在适当的时机抽芽成长，展开它慈善的枝叶，开花、结果。”

从历史上看，我们两国文明、文化的亲属性为无数世纪的印中关系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活力，使它具有一定程度的永恒性。这种亲属性在我们遇到困难、产生误解的时期使两国的双边交往不至于僵持、死板。我们应该把两大文明从远古开始的对话恢复、重振起来，以加强两国友谊的力度。实际上，我们两国过去死灰中埋藏的火花必然会熊熊燃烧，照亮未来陌生的道路。

我们有义务效法哲学家和像来自印度的鸠摩罗什和菩提达摩以及来自中国的玄奘、法显那样的高僧学者，把文化资源治理、收获，开发出智慧、精神，为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哲学提供经久无损的基石。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谭云山教授以他多方面的学术贡献丰富与加深了中印了解。泰戈尔为恢复印中两大文明的辉煌的历史对话所做出的巨大而又不凡的努力，在他 1924 年访华时结下了丰硕的果实。他在圣地尼克坦（和平乡）组建了中印学会，并且和谭云山教授一同在国际大学建立了中国学院来重新推动文化的洪流，促进我们两大文明的汇合。令人感动的是，师尊泰戈尔在创建国际大学时拟定的教育计划，就把中国教育思想列了进去，因为他一

4 祝 词

贯的信念是：印度的教育机制，如果缺少了中国的丰富思想，就会残缺不全的。值得注意的是，泰戈尔和谭云山教授在中国学院的计划中不但包括了印中文明对话，而且包括了世界文明的大部分，包括了理性与科学传统，使对人类文明的了解增加了现代化的角度。泰戈尔说，中国学院的目的是“促进以印度和中国文化为支柱的东方文化的扩展，并且使它与西方的现代科学融合，为全人类铸造新文化”。正是印度和中国的这种广阔的视野，以及光辉伟大人物的博大胸襟，喊出了人类文化应当合一共存的呼声。

正当西方那浸淫不已的单调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扫荡世界，危害我们多元、综合型传统的时候，我们应当立足于并且充分利用我们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去强有力地抗拒这一潮流。只有为我们两国人民提供机会，去加快他们的文化交流，以及保证他们越来越被自己的辉煌文化传统和艺术、音乐、舞蹈的丰富多彩的形式所感染，才能扩展我们文明对话的领域。

我高兴地看到这本名为“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的书，在当代犯有忧郁症的文明冲突论的预言与宣传越来越响亮的时刻出版。本书事实上是对这一危险理论的有力批判。作为谭中教授和北京大学耿引曾教授的合作努力，这本用中、英文出版的书，象征着文明合一。通过他的学术研究以及多部有关印中了解的重要书籍的出版，谭中教授在我们两国对话中是一个杰出、可佩的学者。耿引曾教授是现代中国一位极受尊敬的研究印度的学者——季羨林教授——的得力助手，她写出了两千年来中国和印度之间重要的、有开创性的大事记。耿引曾教授的大事记经过谭中教授的发挥而变成一本重要参考书。谭中教授在介绍中，热情地肯定了他的合作者的贡献。她（耿引曾）不但为本书搜集了知识内容，还在争取著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与筹集（北京大

学)资助上做出了努力。她属于中国学者中学识卓绝、专心致力于印度研究的那一代人。她热情主张增进印中了解的精神实在令人称道。用中文和英文出版的这本书,不但在印度和中国会有,而且在全世界都会有广大读者。值得一提的是新德里文明研究中心的查托巴蒂亚教授,他积极致力于本书的出版,并把它当做推动印中文明对话的更大贡献的组成部分。我怀着极大的愉快心情,祝愿谭中教授和耿引曾教授在出版这本必将带动、鼓励印度和中国学术传统来彻底了解我们两大文明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上,获得成功。

K. R. 纳拉亚南

2002 年 5 月 4 日于新德里

(黄绮淑译)

鸣 谢

本书终于能与读者见面,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但也不能忘记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

耿引曾追随北京大学终身教授、当代中国研究印度的泰斗——季羨林教授多年,受到季老的栽培和提携。谭中虽然长居国外,无法挂号季老门下,但在研究中长期受到季老著作的指引,并且承季老关照,有缘参加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斯里兰卡道路研究所在北京合办的“南亚会议”,从那时开始每有机会到北京,都能见到季老,聆听教诲,受益良多。我们衷心祝愿季老健康长寿,使包括我俩在内的中印两国广大学者,继续得到明灯引路。

我俩都熟识的印度元首纳拉亚南总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承他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光阴为本书写了三页热情洋溢的“祝词”,使本书增色不少。他在“祝词”中对我俩的赞誉,一方面令我们汗颜,另一方面鼓励我们今后继续为增进中印了解而努力。本书第一章中已经指出,曾经有一个时期谭中感到泄气,正是在纳拉亚南总统的鼓舞下,才加快了本书完成的力度。我们对纳拉亚南总统表示由衷的感激,并祝愿他贵体康健,此不仅是印度人民之幸,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印关系的福音。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得到北大副校长何芳川教授和北大教育基金会的资助,特此对他们表示感谢。本书英文版得到新德里文明研究中心,特别是所长查托巴蒂亚(D. P. Chattopadhyaya)教授的关怀、鼓励、支持,查托巴蒂亚教授还对谭中所写的初稿提出

了宝贵意见。新德里的苏嘉姐 (Sujatha Reddy) 博士和薇纳 (Veena Sachdev) 女士帮助谭中收集材料,也做出了贡献,在此一并鸣谢。

出版这样一本书绝对不是两个人孤军奋斗能成功的。耿引曾能够搜集到本书的历史资料,不但得感谢北京的各个图书馆和博物馆,更得感谢中国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以及它对保持历史真实的敏感性。谭中在撰写所承担的部分时有幸作为访问学者造访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中心。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中文资料非常丰富,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很大便利,特此表示感谢。顺便还得谢谢该大学历史系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教授和东亚中心副主任佛斯 (Thed Foss) 博士。

对本书出版作过贡献的人还有许多。为了节省篇幅,恕不一一指名。但对他们的各种形式的帮助,我们永远感激不忘。

谭中 耿引曾

目 录

序	季羨林 1
祝词	K. R. 纳拉亚南 3
鸣谢	6

上编 中印交往之透视

第一章 引言	3
第二章 透视景观	57

中编 中印交往史实

第三章 资料简介	121
第四章 中印关系大事编年	139
第五章 高僧一览	254
一、印度来华弘法高僧	254
二、中国赴印求法高僧	283

下编 综论

第六章 中印文明比较	297
第七章 佛教是中印桥梁	323
第八章 中印合璧(一): 寺庙文化	347
第九章 中印合璧(二): 金轮帝制	375
第十章 中印合璧(三): 风流人物	408

2 目录

第十一章	中印合璧(四):金玉符号	436
第十二章	中印合璧(五):龙凤双飞	479
第十三章	结论	520
书目		531

上编 中印交往之透视

第一章 引言

印度前任总统纳拉亚南(K. R. Narayanan)2000年5月30日在北京大学讲演时说:“我们应该加强文化联系,让(中印)两国人民享受几千年来自己丰富多彩的艺术、音乐和舞蹈。依靠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我们可以抵挡来自西方的、威胁我们文化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全球化文化与咄咄逼人的文化模式。文化多元化应该成为有持续性的世界多元形态的基石。”^①纳拉亚南总统是作为超党派、超意识形态的印度元首到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的。他在言论中一贯避免涉及政治与争论性领域,但仍然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印“文化联系”,发扬两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来克服当今“全球化文化”中的不健康现象。他认为中印传统精神文明的光芒可以帮助驱散当前国际秩序的乌云。他的这番话等于是吹响了恢复中印文明对话的号角,具有政治意义。

本书缘起

本书的写作其实也受到纳拉亚南总统2000年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的鼓舞。读者也许觉得奇怪,这还得从头说起。当代中国的印度学泰斗、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羨林在过去五十多年间在北大

① 北京印度大使馆供稿。

培养出一批研究南亚的生力军,他们默默无闻地、辛勤地为大规模开展中印文化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个研究集体的开创性贡献之一就是把他们手中掌握的史料公诸于世,为中外学者作深入研究提供方便。这些史料中最有用的是90余万字、分上下两卷的《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季羨林为这本书写的“序”中有一段话:

北大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的耿引曾同志,多少年来从事在中国载籍中搜集有关南亚史料的工作。辛辛苦苦,翻阅各种各样的典籍,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到了今天,搜集的成绩斐然可观。我们曾经将这个信息,对外国朋友,特别是印度朋友讲过。他们听了,都异常兴奋。

耿引曾在负责整理出上述这本书后,进而编出了“中印大事记”。我是最早看到她的“大事记”手稿的极少数人之一。那大概是七年前的事了。拜读后我立刻意识到这些资料对印度学者研究中国无比重要,就应允和她合作在印度出版一本介绍中印两大文明之间亲密交往的英文图书。设在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也欢迎这一出版计划,为它准备了一笔预算。此后,耿引曾源源不断地把补充材料寄给我,因为翻译成英文还得靠我执笔。不过,由于我手头还有许多别的事务,主要是赶时间另外出版了中印交流与增进两国相互理解的三本书,就把本书的出版耽误了。

在1998年赶出了三本书(两本英文、一本中文)后,我颇有点精疲力竭。1999年我超越了人生“古稀”之限以后,发现身体应该调整,更把没有完成的本书出版计划暂时搁置一边。2000年5月30日,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在北大校园中讲话时特别提到我在孜孜不倦地推动中印研究,使我心中的事业之火顿时死灰复燃。我又从纳拉亚南总统强调加强中印文明对话的讲话中得到启示,经耿

引曾同意,改变了原来的出版计划,决定由我参加中文写作部分,同时出版中英文两个版本。近一年辛勤劳作的结果,就是这本书中文版得到北京大学领导和商务印书馆的重视,在北大的资助下由商务出版。英文版得到新德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印度著名哲学家查托巴蒂亚教授的关注,并确定了一项以本书为发动机的中印文明对话的研究工程。这样本书终于能在中国和印度首都以中英文两个版本同时问世了。

这也许是我一生最后一部著作,有了它,自感没有枉活一辈子。我本是个庸碌之辈,人生道路曲折、坎坷,之所以能够进入大学和精英社会,主要是由于身处中印两大文明之间,在印度被误认为“中国通”,在中国被误认为“印度通”。这样的学术生涯倒把中印文化交流变成我整个生命的内容,就连平常言行、谈吐都三句不离“中印交往”了。现在又出了本书,更把自己的名字塞进“中印交往”的网址,将来在黄泉之下也不寂寞。但扪心自问,我对本书的诞生,主要是起了接生婆的作用,是“借花献佛”。

记得六年前在印度首都开展“印度中国相互洞察”(India and China looking at Each Other)活动,得到颇为热烈的响应,开了好几次学术讨论会,出版了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1998年10月29日在北京印度大使馆庆祝谭云山诞生百周年晚会上首发,又于11月7日在圣地尼克坦庆祝谭云山诞生百周年大会上献给印度总统纳拉亚南)。从此书的英文名字可以看出,它代表了印度知识精英决心深入了解中国的努力,力图跨越两国近百年来数代人彼此之间“喜马拉雅山脉”似的“鸿沟”。我曾经要求中国的南亚学者对这本书进行批判式的研究,并用中文出版一本类似的“中国知识界努力了解印度”的书,虽有人响应,但还得克服文字上的障碍(需要组织翻译)